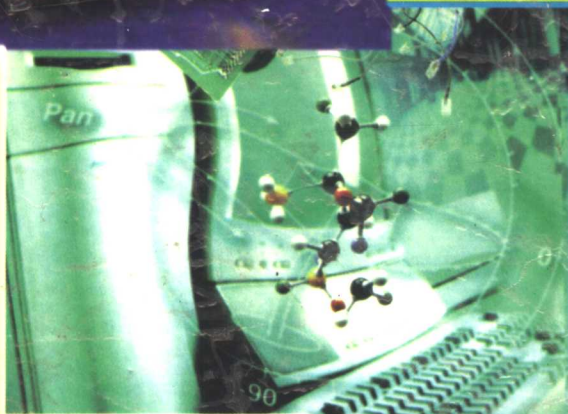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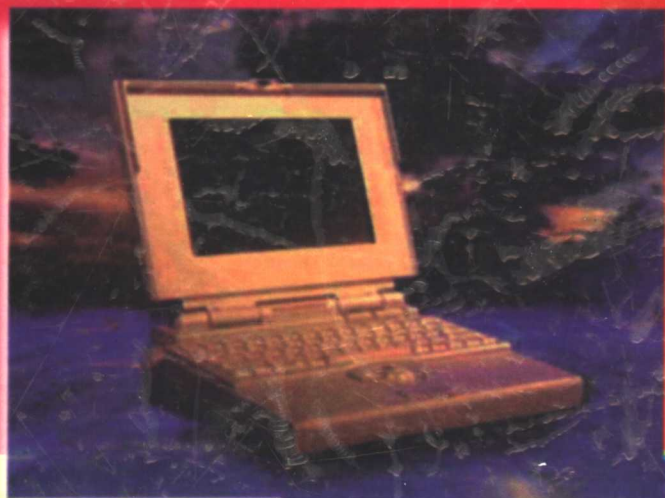


教育案例大系

总主编 柳 斌
主 编
周 宏 高长梅



教育改革案例全书

长 城 出 版 社

教育案例大系

教育改革案例全书

周 宏 高长梅 主编

(下卷)

长城出版社

课程教材改革

世纪之交的课程改革与发展

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已形成密切联系的整体,各国的企业都面临着全球性的竞争。进入 90 年代,政治局势趋于缓和,经济对抗却越演越烈。美日对抗、美国和欧共体的磨擦,将经济竞争提到对抗的首位。发展经济要靠高新技术的发明,如何改革课程以培养高新技术人才是当今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

根据热力学原理,封闭性的系统交流能量但不交流物质,而开放性的系统既交流能量又交流物质,通过交流达到自我更新。我国的课程模式,目的是事先规定好的,根据目的制定具体目标、手段、程序和步骤,然后贯彻既定的方案,最后再归结于预定的目的。这种模式抗拒变革,排斥干扰,难以适应社会高速变化的需要。

课时是一个常数,但如何科学合理地分配各个科目在学生活动总量中的比例,却是课程结构合理与否的关键。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的优化结构,可以较理想地解决课时有限和知识无限的矛盾,是解决共性与个性,打好基础与发挥特长等矛盾的重要途径。现行课程结构暴露出的问题是单一和硬性,即重必修课程、学科课程,轻选修课程、活动课程,硬性有余而弹性不足。

课程内容几乎不断受到指责,其弊端是过于理论化和分化。也就是说,课程的主体是系统的学科知识,距离现实生活甚远,忽视实用性与整体性的统一,未能适应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或者密切联系人类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是以统合的、一体化的形式组织和呈现课程内容。

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课程学习的方法是把那些死的知识记忆下来,过分依赖理论和记忆。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代言人全面控制课程的组织与开展,他们给予传统的、书面的、叙述的表达方式以特殊地位,损害了口语的表达、个性的发挥、自发精神和创造性的研究以及能力的培养。学生仅是知识的被动的接受者,学生个体的探索和体验得不到重视。

一、课程决策的出发点

课程决策是课程从理论到实际的过程,是影响学习内容的自觉的政策选择,旨在控制教学目的、教材、教学方法和教学程序,课程决策是课程发展中较为具体而重要的部分。

课程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教育活动系统的环境是整个社会,课程是教育活动系统的要素之一,是整个教育活动的基础课程确定离不开社会环境,社会发展和社会需要有力地影响并制约着课程。开放的课程鼓励变化,接纳干扰,允许流动,外界的各种刺激和影响成为促进内外部之间交互作用从而达成内部重组的手段。

课程应是一个弹性化的系统。不管是从世界范围看,从一个国家的角度说,还是从个体的差异性方面说,不同国家、地区、学校、个体皆存在着差别。课程不能强求一律,以至统一模式、同一面孔,使地区没有差别,学校没有特色,学生没有自主权。

课程应是一个平衡化的系统。学生应当学习宽广平衡的课程,这正如他们需要广泛而平衡的营养一样。“平衡”有 3 层含义:其一,不论具体培养目标如何,各级各类学校为

了保证教育质量,都应全面地设置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的课程。其二,保证普通科目和职业科目的平衡性。其三,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并重。各部分都应成为课程结构的组成部分,彼此配合,相互补充,形成合力,从不同方面为实现培养目标服务。

二、课程目标的确定

课程目标是关于教学科目所要达到的目标,是通过教学所要完成的任务的指标体系,也是学校培养目标在教学科目中的体现,反映了教学内容的方向和性质。

21世纪是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管理能力的加强决定世界命运的时代。越来越多令人难以应付和掌握的信息量间接而有力地表明,一种有助于人们确定方针、选择和利用科技成果的行为和能力是何等重要。由此产生的课程目标的新观念是:课程不应仅限于给学习者坚实的学科知识和培养他们对继续学习的兴趣,还应培养人的行为和能力并深入精神生活之中。劳动社会的流动和迅速演变,有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大量增加等等,也表明行为和能力日渐增长的重要性。这些变化需要和产生于教育体制内部的压力结合在一起,使课程目标别无选择:必须着重基础知识和具备掌握、丰富、更新知识的能力。

依照惯例,学校在安排课程时总是依据一种传统的课程目标思想,优先重视获得知识,其次是态度和技能,考试和会考则是评价所得知识数量的依据。现在人们发现,具有坚实行为素养的人更适于学习和更新自己的专业和文化知识。换言之,价值观念和行为的培养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新的课程目标观重视在各层社会生活中传播的越来越多的信息,与社会的要求相适应,与科学自身的发展及其对社会和个人生活产生的作用协调一致。课程不仅是知识供给系统,还将进一步成为保证个性全面发展的系统。

三、终身学习与无缝课程

人和其他生物的不同点主要就是由于他的未完成性。事实上,他必须从环境中不断地学习那些自然和本能所没有赋予的生存技术。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继续学习。正是从人的需要和可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角度出发,西方教育界最先提出了“终身教育”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概念。

终身学习的思想对学校教育、课程系统都有革命性的意义。首先,必须对个人学习进行通盘规划,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必须按连续性的教育计划进行。其次,现有的课程体系必须重新组织,使之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多样性,以适应个人的选择。第三,课程设置必须避免所要学习内容之间的互不连贯,而应有整体性和连续性。也就是说,在伴随着技术不断增长而富于信息的社会,学习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生活方式需要设置“无缝课程”(seamless curriculum),即在学校中抛弃年龄和年级的限制,施行一种开放的、可接纳所有人的、随时可进入的课程。

四、课程改革的趋势

建立连续的多向型课程系统。为满足未来人在态度、兴趣和学习需求方面的变化,并适应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和工商企业对多种人才的需求,课程系统将由现在的阶段的单向型转变为连续的多向型。即课程系统不只是面向某一阶段或特定阶段的学习者,未来的学习是终身的持续的过程,是使人们适应不断变化着的条件的过程。所以,课程须有整体

性和连续性,是一种抛弃年龄和年级的限制,倡导开放的、可接纳所有人的、随时可进入的系统。在这一连续性的系统中,学生可有多种选择,多种发展方向。而且,不会因为选择了某一类课程则一锤子定音,限定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所有的课程都是为培养完善的人格和为日后的生活作准备的,学生能够较为自由地转换课程类别,以便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课程极富弹性。首先,表现为选修课程的增加和倍受重视,必修与选修相互关联。

人类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方面求广泛经验的获得,一方面兴趣与需求又因不断的生长而渐次分化。因此,课程也必须供给新的可选科目,务使每个学生均各得其所,各展所长,适应个人与社会的需要。其次,课程内容具有伸缩性,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各级课程中又有综合型和分科型,高、中、低程度,或A、B、C几类,或Ⅰ、Ⅱ、Ⅲ几型。总之,课程均留有余地,供各方酌量灵活选择。第三,课程的教学顺序和时数也具有弹性,通过配合时令、季节、事件以及学生的特殊性,而自行调整或补充,做到优势化和特色化。

课程内容的一体化和实用性、国际性。课程的宗旨在于重视人类面临的实际问题,以一体化的形式组织和呈现课程内容,甚至从整个社会环境的角度来看待课程及其相关因素,将课程内容置于人类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之中予以建构。即突破原有课程内容的局限,采取实用的、一体化的形式,选择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课题,注意学科形式的实用性,学习活动体现出活动性和应用性的特点,增加计算机、环境、人口、和平、健康、媒介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当今,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还呼唤着国际教育。课程内容的国际化意味着将国际观念渗透到课程内容中,提高“国际性”的基本要素,提高在国际化社会中的外交能力、科技能力、管理社会和企业的能力。还应增强自主的社会公民意识,加深对各国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知识的理解,学习通过他人的眼光、心态来看待事物,尊重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中所存在的多样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形成对国际事务的关心。

课程成为一种发展的过程。教育是促进变革的事业,课程与教学都应旨在改革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以促成发展。发展意味着变化,但与传统体系不同的是,这种变化不是以受控的、累加性的方式逐步实现的。反映在课程领域中,学生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也不只是客观现实的简单反映,而是由机体自身或机体对外部力量的反应所引起的内部再组织,是一种质的变化,它永远地改变一个人与自然、生活、环境、学习的关系,课程强调的便是这种再组织的能力和探索、创造的精神。于是课程不再作为某一特定知识体系的载体出现,而成为一种发展过程。课程通过给予学生自我组织的时间和机会,在最有利的时机引发其内部的不平衡,以图达成新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不再作为知识的权威将预先组织好的知识体系传递给学生,学生也不再作为知识的接受者被动地听从教师的指令,而是带着各自的兴趣、需要和观点去认识客观世界、探索新知。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以一种生产思维性(generative thinking),用多种方式发现和抽取信息,并在各种观点的冲撞与融合之中形成在共享基础上的新的理解,从而导向创造性的发现。

(汪 霞)

邓小平旗帜指引教材改革和发展

邓小平说：“关键是教材。”“教材要组织专门班子编写。”科学研究是教材质量的根本保证。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轨。坚持“一体两翼”的方针。《课程·教材·教法》杂志及时发表“三个面向”题词。人民教育出版社率先出版《邓小平论教育》。中小学教材改革必须解决的两个问题。“全国中小学教材发展中心”呼之欲出。

—

校舍、师资、教材，是中小学教育的三大基本建设。党和国家一贯十分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于1950年批准成立以中小学教材建设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主席还亲笔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写了社名。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长和发展，走过坎坷的道路。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创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邓小平同志等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人则使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十年动乱后获得了新生，邓小平旗帜指引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事业在新时期不断改革和发展，推向前进。

“十年浩劫”中的1969年，人教社全体人员被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1月，绝大部分同志被分配到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年3月，人教社主要负责人戴伯韬通过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上书周恩来总理，请示恢复人教社；7月，得到批准。但重建工作十分艰难，原180名编辑，到1976年只准调回近30名，而且不准编中小学教材。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下，人教社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

历史的发展，终于到了重大转折的关头。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同时对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尤其是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首先紧抓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并自告奋勇地要为教育工作当“后勤部长”。他一开始就敏锐地抓住了教育改革的核心——课程教材问题。他在1977年就强调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据原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同志的回忆说，当时的教育部真是一副烂摊子，乱糟糟的。原来编教材的机构和人员都没有了，原人教社的班子早已发配到外地。针对十年动乱中教材混乱的状况，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他果断地指示：“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大中小学教材。”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党组为尽快增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以适应编写教材的迫切需要，报请中央批准从各省、市抽调一批编辑出版干部。邓小平同志在看到这份报告后，不几天就作了明确批示，指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1977年～1978年教育部为人教

社从全国 1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调了大批干部,连同人民教育出版社干部,共 200 余人,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按中小学学科,分 12 个编写组开始工作。

各路人马调集北京,首先遇到的是房子问题,但当时的情况非常困难。据当时分管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同志回忆——几乎把北京城都跑遍了,到处为教材编辑干部找安身之地,但始终无法解决。后来又回到当时的西苑旅社,我还亲自跑了几趟,找经理商量,但没有钱根本住不进去。恰巧国务院秘书长(曾任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也去了,其中有我认识的两个熟人,我就和他们谈了房子的事。他们用手指了指八宝山第一接待室说,小平、先念同志都在里面。为了解决房子问题,我只好去惊动最高领导。先念同志见到我就问:“通修同志有啥事?”我如实地把房子的事报告了。还没等先念同志说话,小平同志就说:“把他们叫进来。”北京市的领导同志进来后,小平同志对他们说:“马上办,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就这么两句,北京市的领导立即着手解决;调集北京的 200 多位同志得到了妥善安置,住进了西苑旅社 9 号楼,后来又搬到条件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仍然抽空看“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简报,直接领导教材编写工作。“教材编写工作会议”还聘请了 45 名一流专家担任各科教材顾问。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全国通用的中小学各科教材编写工作进展顺利,1978 年就开始出版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各科教材,以后又陆续供应其他各年级教材;1980 年完成了全套教材即各年级各学科教材的编写任务。这是十年动乱后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也是人教版第 5 套中小学教材。这套教材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高教育质量,稳定社会秩序立下了功劳。

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教材建设和改革,发表过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意见。早在 1977 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东西。”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央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挤出 10 万美元专款拨给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协助下,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选购了大批教材,并通过空运尽快运回国内,供编写我国教材参考。人民教育出版社认真研究了引进的外国中小学教材,并就数学教材提出了报告。教育部于 1977 年 9 月 15 日以“简报增刊”报送中央。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关心,并很快作出指示。9 月 19 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到 1978 年 2 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引进的外国教材已达 2200 册。在以后的年代里直到今天,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直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以各种方式方法,通过各种渠道,不间断地搜集、选购、引进国外中小学教材,作为借鉴。据统计,截至 1998 年 7 月,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引进的外国中小学教材约 15000 册,其中中学教材约 8000 册,小学教材约 7000 册。

在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思想的鼓舞下,人民教育出版社从 70 年代末起还组织力量,陆续编译出版了《外国教育丛书》33 种,全方位地介绍外国基础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概况、特点和改革发展趋势,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课程教材改革问题。这在全国也是最早的,为打开世界教育之窗作出了可贵的尝试。新华社为此曾专门发了内参,指出,这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在教育方面的反映。

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课程教材的一些重大的实际问题,也十分关心。1977年,他亲自向浦修同志过问并要求研究高中数学、物理课程与大学的衔接问题;根据王力、吕叔湘等语言学家的建议,他还亲自过问了中学语文课程的改革问题。1978年2月24日,教育部将人教社历史组1977年9月草拟、1978年2月油印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报送中央,当时主管教育、科学工作的党中央领导方毅同志3月7日将报告送请邓小平同志审批。邓小平同志于3月9日就作了“原则同意”的批示。这份报告共提出了9个原则性问题,其中第七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批示:我的名字不要出现,活人以少宣传为好。后来,经邓小平同志批示的这份《意见》还成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的重要参考文件。

二

只有经过艰辛的科学研究,才能编出高质量的中小学教材,这是几十年来人教社的根本经验。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把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更好地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教育部党组于1983年7月同意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请示报告,正式发文,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教育部的批文下达后,课程教材研究所全体同志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恳请他为研究所题写所名。正因为邓小平同志一贯关心、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事业,所以当我们请他为“课程教材研究所”题写所名时,他及时地答应我们的请求。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但在百忙当中,欣然命笔,为课程教材研究所题写了所名,于7月中旬送到人教社。据我们所知,邓小平同志亲自为一个教育研究机构题名,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仅再一次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与改革事业的殷切期望和巨大支持,也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他对教育的重视,对科研的重视。

事实证明,课程教材研究所的成立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先后参加了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是全国第一家课程教材学术期刊,80年代初最早发表的一批知名学者的文章,吹响了我国新时期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的号角,在理论上和舆论上为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准备。近年来这份杂志越办越好,以定位准,品位高,理论联系实际,雅俗共赏而著称,荣获全国首届社会科学期刊奖,成为全国教育类核心期刊,内容质量和发行数量都在全国同类杂志中名列前茅,成为广大教师的挚友,教研的参谋,教学的助手,深受欢迎。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以来,也进一步密切了我们同全国各地中小学教研部门、教育科研部门的协作,以科研带教研,以教研促科研;并且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同海外学术研究机构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的渠道。课程教材研究所已经同世界上数1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建立了学术交流和业务合作关系。在许多方面,研究所往往能发挥出版社难以发挥的作用,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出版社很难与教材研究和教材编写联系起来。课程教材研究所没有辜负邓小平同志的期望。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教育部党组决定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二者相辅相成,对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和改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有助于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更好地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这种做法有利无弊。我们有责任把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办得更好,注入新的机制,为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事业更多更快更

好地出成果、出人才。

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国家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小学教材逐步趋向于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并实行编、审分开的制度。人教社坚决拥护中小学教材体制改革,并积极顺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起带头示范作用。在第7套、第8套教材陆续出版使用的同时,人教社从1988年就开始研究编写九年义务教育“六三制”和“五四制”两套新教材,作为国家规划的多样化的义务教育教材的两个系列。1995年又开始全面投入与九年义务教育相衔接的、面向21世纪的普通高中新教材的编写工作。这是人教版第9套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小学教材。

人教社1950年建社以来,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历次课程(教学)计划,受教育部委托,先后主持或参与主持编订了历次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编写、出版了9套面向全国中小学的各科教材(含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按通常的表述,简况如下:

序列	开始编写的时间	开始出版的时间	备 注
第一套	1951	1951	(1)这套教材是对十二年制中小学老教材的修订或改编 (2)根据中央指示,1952年曾新编五年一贯制小学课本,1953年停编
第二套	1954	1956	(1)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 (2)汉语与文学分编,1958年又合编
第三套	1960	1961	(1)十年制中小学教材 (2)未编历史、生物课本。地理课时大量削减,编了暂用课本
第四套	1961	1963	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
第五套	1977	1978	(1)十年制中小学教材 (2)全套教材编写于1980年基本完成
第六套	1983	1984	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
第七套	1987	1988	对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作较大的修订,或新编
第八套	1990	1991	高中教材较大的修订
第九套	1988	1990	义务教育“五四制”“六三制”两套系列化教材
	1995	1997	(1)与九年义务教育教材衔接的新编普通高中教材 (2)1997年起在山西、江西和天津试验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人教社现已建设成为以中小学教材建设为中心的综合机构。纵向: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高等师范教育专业教材;横向:从普通中小学,到中师、幼师,到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教材;学科:从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到数学、自然学科、技术学科;品种:从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到学生课外读物、教师进修读物以及教育学术图书;形态:从文字教材,到音像教材,到电子教材……

人教版教材和图书出版品种逐年增长,改革开放后的增长更为迅猛,下面仅以七五和八五期间即1986年至1995年为例:

年度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品种	717	928	1049	1162	1355	1529	1551	1546	1642	1810

人教社建社近半个世纪来,出版品种累计约2万种,总印数达300亿册。与此同时,获奖的教材、图书品种也逐年增多,不胜枚举。人教社的事业发展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轨。人教社已经成为全国历史最久、规模最大、效益最高的中小学教材研究、编写、出版中心。

四

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亲手创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使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十年动乱后获得了新生,并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给人教社注入了新的活力。回顾人教社近半个世纪在中小学教材建设上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在邓小平旗帜指引下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的经验或者说体会,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坚持”。

坚持“质量取胜”的方针,以研究、编写、出版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小学教材为首要任务,把人教社建成全国最大的中小学教材研究和编写中心。这是国家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也是全国广大中小学师生对我们的期望。

教材是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集中体现,是学校培养未来人才的蓝图。今天的幼苗,是明天的栋梁。今天的中小学教材,应该体现明天的社会前景。没有高质量的教材,就没有高质量的人才。

为此,我们认为:

——必须把教材编写工作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中小学的学科不等同于科学,一门学科的教材不是那门科学著作的缩写或简化。教材是为了达到预定的培养目标,完成预定的教育任务,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征和知识、能力基础,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教育的材料,因此必须科学地合理地选择和组织。每一学科的教材都有它的特殊性,同时各门学科的教材又有共同性:必须解决好政治思想品德教育与科学文化知识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文化新成就、新成果的关系;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统一的基本要求与各地、各校、各个学生的差异性的关系,等等。要确立正确的编写指导思想;要广泛调查、征求意见;要对历史上的教材和国外的教材进行分析、比较;要经过试教、反复修改。所有这些科学研究工作,都是教材编写所必需的基础和前提。

——必须发扬认真严谨、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中小学教材关系到千家万户、子孙后代。中小学教材里的一句话、一幅图、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有可能影响学生一辈子。正如人教社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叶圣陶先生所说,编教材决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博采百花精华,经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才能酿出蜜来。教材编写工作者只有学问专精,又博览群书,融会贯通,集思广益,才能编出好教材。大学问家严复100多年前(1906年)说过:“最浅之教科书法,必得最深其学者为之。”只有锲而不舍、千锤百炼、一丝不苟、精雕细刻,才有可能诞生一部富有生命力的教材。

——必须依靠各方面的专家和全国各地的广大教师。教材是教师教、学生学的主要媒体,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离不开教材。教材应当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广泛的适用性。

要达到这一要求,光靠研究所、出版社内部的专职人员是远远不够的。走出去,请进来,实行教材研究和编写的专职人员同教育学和心理学专家、课程和学科专家以及广大教师、教研人员三结合,是教材编写的必由之路、成功之道。

坚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方针,把人教社建成全国最大的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中心。中小学教材的对象是两亿中小學生,连结着千家万户。中小学教材能不能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不仅关系到全国各地中小学能否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更关系到整个社会能否维持稳定的局面。不管是纸张、印刷、储运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千方百计,竭尽全力,保证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从80年代末起,在中小学教材趋向多样化的竞争形势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仍达70%以上;人教版教材课前到书率在全国平均达到98%以上,多数省市更达到100%。人教社与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出版印刷部门和新华书店、外文书店发行部门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人教社联合全国31个省级中小学教材租型印行单位,形成了覆盖全国的中小学教材租型印行网。由于人教版教材印量极大,因此人教版教材在开本、版式、色彩、装帧等方面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极大地带动了全国造纸行业、印刷行业的技术改革和设备更新。

坚持“一体两翼”的方针,把编辑出版各级师范院校教材和资助出版教育学术图书放在重要地位,为提高中小学师资水平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小学师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小学教材的使用效果。因此,人教社每编出一轮新的中小学教材,都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各地中小学教师进行多级培训(包括援藏支教,培训西藏中小学教师);同时,人教社一贯坚持以中小学教材为主体,以师范教材和教育图书作为人教社不可或缺的两翼。主体结实、展开两翼才能腾飞。从50年代起,人教社就开始先后编辑出版中师、高师、幼师教材,此后又出版了《师范教育丛书》、《小学教师之友丛书》等。人教版教育图书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素以品位高、品种多饮誉海内外,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育文献,如马、恩、列、毛泽东、邓小平论教育等;重要的教育文献资料,如《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等;大型教育学术丛书,如《教育学文集》(26卷30册)、《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10卷13册)、《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24卷)、《外国教育名著丛书》(39卷45册)、《叶圣陶教育文集》(5卷)、《蔡元培年谱长编》(4卷)、《比较教育丛书》(10卷)等。还有广受欢迎的工具书,如《新华字典》(1953年)、《新编小学生字典》(1983年)、《儿童图画字典》(1987年)等。此外,每年都资助出版一批教育学术专著,在全国教育界尤其是教师中拥有实力雄厚的作者群和相当宽泛的读者群。

坚持人才培养、队伍建设领先的方针,加强国家专业队伍形象,努力在全国性学会(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和国家重点教育科研课题中,在学科建设中,发挥学术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点教育科研课题,主要有《普通中小学学制、课程、教材、教法改革与实验》、《普通中小学课程改革的试验与研究》、《普通教育整体改革的研究与实验》、《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验》、《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材建设现代化的研究》、《21世纪中小幼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与实验》、《国际中小学课程教材比较研究》等,相关成果正在陆续出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全国中学语文、小学语文、中学数学、小学数学、中小学外语、历史、地理、化学、生物、自然、体育等学科的教学专业委员会,以及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等20多

个学术团体均挂靠在我社(所),由我社(所)有关学科人员任主要负责人。通过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课程·教材·教法》,也团结了一支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与研究的骨干队伍。

8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主要领导同志明确提出,要把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办成全国中小学教材研究中心、编写中心、出版中心和资料中心。这是对我们工作的充分肯定和巨大鞭策,也是我们始终不懈、努力奋斗的目标。

五

1983年国庆节前,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邓小平同志作为世纪伟人,站得高,看得远。“三个面向”是邓小平同志对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方针的总结和提炼。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的普遍意义和深远意义,并不是一开始就为所有的人们所认识 and 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率先刊登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题词,并编发了北京景山学校的文章。当时《课程·教材·教法》是双月刊,发稿见刊周期至少在两个月以上,因此,在《课程·教材·教法》杂志1984年第1期上见刊的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应当说是相当及时的。此后,在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10周年之际,人教社又出版了《开拓者的足迹》和《未来与教育》等书,进一步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在《开拓者的足迹》一书中,首次详细披露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的背景和经过,十分有助于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有很多是发端于教育领域的。早在1989年下半年,人教社就不失时机地作出决定,在出版马恩列毛教育论著的基础上,把《邓小平同志论教育》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组稿工作得到国家教委党组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大力支持。书稿于1990年特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完成,在人教社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该书在最短的时间内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全国最早出版的邓小平同志教育文选,其中有4篇文章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当时有关部门指示,对本书的出版消息不登报、不广播、不宣传。然而这本书很快被列为全国高校教材,逐年重印,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学习邓小平同志教育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久,我们又约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校等单位,编辑出版了《邓小平教育思想概述》,作为配套读物;并对《邓小平同志论教育》增补了15篇文章,还恢复了一些原来被删去的篇目,例如《重视智力开发》、《要利用外国智力》等篇,出版了第2版即《邓小平论教育》,使之成为目前国内外最完整最权威的邓小平教育文选。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有关同志说,邓小平同志生前看到了这本书,对编辑出版工作感到很满意。

六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了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并不是任何时候什么教育都能提高国民素质、都能培养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才。100年前,面对灾难深重的内忧外患,志士仁人们为了救亡图存,喊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呼唤新学堂、新教育问世。因为清政府腐败的科举教育弊端丛生,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非但救不了国,反而误国害国,甚至使国家滑向亡国的边缘。100年后的今

天,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中央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全党和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他又指出:“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这是面向 21 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1998 年 5 月 4 日,北大百年校庆讲话。)也就是说,只有正确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才能提高国民素质,才能培养创新人才,才能兴国,而唯应试教育非但兴不了国,反而窒息人的创新精神,摧残人才,扼杀人才。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振兴中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必须大力推进素质教育,为极大地提高全民族 12 亿人的素质奠定基础,培养一批又一批富于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推进素质教育,是新时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具体举措,其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学生各方面的素质得到全面发展、主动发展。而唯应试教育的着眼点只在少数学生的升学;只追求考试科目的高分;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只是为了被动地应付考试。素质教育是针对唯应试教育的弊端而提出的。

素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全方位地推进,才能奏效。首先要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使全体师生和家长乃至全社会都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质量观、人才观,这是根本的前提;而加强课程教材建设,改革教育教学内容是核心;提高师资水平是关键;完善考试、评价制度是导向。四者缺一不可。

加强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改革教育教学内容,就是要解决好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的问题。这个核心问题要解决好,必须以三个面向为指针,全面地准确地理解素质教育的内涵。

“三个面向”是邓小平同志重要的战略思想。三个面向的真谛是面向现代化,适应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面向现代化,就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正是为了面向现代化。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从空间上看,或者说从横向上看,必须面向世界,放眼世界,既要看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又要努力寻求教育的共同规律,把目标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借鉴世界各国一切先进经验,进而使中国走向世界,跨入世界先进行列。而如果闭关自守,夜郎自大,那只能越来越落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从时间上看,或者说从纵向上看,必须面向未来,着眼未来,把目标定位在培养跨世纪人才上。今天的教育,必须着眼于明天的科技,后天的社会。

教育现代化,决不仅仅是办学条件设备等“硬件”的现代化,而且更重要的是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技术、艺术、手段、方法,教育管理、评价等“软件”的现代化。

三个面向是一面理想的旗帜,是一面鼓舞我们为理想而奋斗的旗帜。如不高举这面旗帜,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行动就没有远大的目标,理想就永远不可能变为现实,我们就有可能永远落后,甚至挨打。

当然,要面向世界,就必须立足本国,既要大力提倡借鉴,洋为中用,又要加强分析、鉴别,反对生搬硬套。要面向未来,就必须立足现实,同时正视历史,恰如其分地继承传统,进而开拓创新,以免盲目走弯路,或重复走老路。我国的现实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之一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这是最大的国情。同样,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学生,基础和条件也很不相同,发展也极不平衡。就学校而言,既有一批已经达到或即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学校,又有一批薄弱学校,需要下大力气解决教育投入和师资问题,以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甚至还有不少极为贫困极为落后的老少边穷地区渴望社会伸出援手的希望小学。

以三个面向为指针,对素质教育的内涵,对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主动发展,应有全面的准确的认识和理解。既不应“以素质教育之名,行应试教育之实”,“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也不应任意地或片面地解释素质教育。

“全体学生”是由每个学生组成的,每个学生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差异性,也就是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基础、程度、水平。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每个学生都齐步走,既不可能、不应该要求每个学生都高起点,也不可能、不应该要求每个学生都低起点。每个学生只要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在自己的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进步,就是成功。中小学课程教材,既要为全体学生打好共同的必备的基础,使他们达到统一的基本要求,又要根据社会对人才的不同需求,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为他们今后能胜任不同的学术专业和技术行业,打好分流的基础,作好必要的准备。

“全面发展”并不意味平均发展。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应是统一的。培养通才是正确的,但对于通才,要有辩证的认识和理解:其一,人无完人,才无全才。通才不等于全才。其二,所谓通才,所谓文理兼通,在程度和水平上有不同的层次之分。其三,通才的最主要特点是既要博学多才,更要善于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也就是说要学会学习,学会求知。中小学不可能教一切知识,也不可能学一切知识。具备求知的能力,掌握求知的方法,比掌握现成的知识更重要。我们必须要求每一个中小学生在各方面都达到合格的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而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得到更突出的发展,达到更优异的水平。门门全优、门门精通当然好,但这毕竟只是少数学生才能达到的。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与其追求门门全优、门门精通而又达不到,以致浪费了有限的时间精力、丧失信心,不如门门合格,几门优异。

“主动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使他们的学习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能充分调动起来,发挥出来,从而能生动活泼地发展。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其一,要正确对待教师的作用。强调学生要主动发展,学会学习,非但不意味着教师可以减轻责任,甚至放弃责任、放任自流,相反是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这里首先是要教,要导,要教导得法。非但不能削弱反而应当加强教师的教导、指导、引导、诱导作用。其二,要正确对待课业负担问题。过重的课业负担固不可取,但是必要的负担和压力,反而会成为激励学生刻苦学习的动力。只有跳一跳摘到的果实,才是既饱含艰苦又充满愉快的,才会倍加珍惜、终生难忘、回味无穷。

基于以上认识,展望未来,中小学教材改革应当如何努力呢?

(一)正确处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基础性与层次性的关系,进一步改革中小学教材体系、结构和内容

教材体系、结构和内容的改革,要兼顾三大要素,即学科体系、学生发展、社会需要。目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学科本位论的偏向。所谓学科本位论有种种表现:其一是绝对地强调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全面性、系统性,把学科与科学等同起来,求全责备,而对中小学生的身心特点和现有程度也就是中小学生的可接受性考虑不够,对社会需求的定位不恰当。二是在对待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时,缺乏宏观的整体观念,片面强调本学科的重要性,以至每门学科都面面俱到,层层加码,每门学科都“高筑墙、深挖洞、广积粮”,造成教学内容深难重。三是只重视学科课程、学科教学,而不重视活动课程、活动教学所能起到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学科体系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全面性、系统性是相对的,也是有层次之分的。学科体系要真正成为中小学教材体系,还必须重视学生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因素。教材体系要加强本学科的纵向衔接和照应,更要注意同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和配合,克服脱节和不必要的重复。同课程结构(全部课程设置的总体结构,各门课程各类课程的组合关系)要整体优化一样,教材结构(每门课程、学科的具体结构)也要整体优化,这样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只有树立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才有可能正确对待学科体系和社会需求。所谓学生发展,就是要兼顾教育对学生的三大功能:传授知识,培养能力,陶冶品德。也就是说,始终要抓住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这个根本,提高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能力(特别是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将智力和能力融合为智能。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是知识经济时代。笔者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确切地说是智能经济时代,说到底,其实质其特征就是以开发人的智能为根本动力,来带动经济的起飞,推动经济的发展。潜藏于人脑的智能是宇宙间蕴藏量最大、也是能量最大的能源,生生不息,只有进行开发,才能使之由内潜变为外烁,转化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动力。一方面,智能(包括智力、能力)必须以知识为基础,没有丰富的知识,智能就无从开发;另一方面,知识也只是智能的基础,知识如不升华为智力、能力,这样的知识再多也是意义不大的。

作为基础教育的中小学,其任务不是培养某门学科某一方面的专门家,而是为之打好基础。应当教给学生最基础、最一般、最通用的知识,这些知识具有最强的稳定性,最广的适应性,最长的时效性,最快的迁移性。这些知识应该是终生难忘、终生受益的东西。这些知识学到手,进而学会学习,学会求知,智力和能力的发展就有了基础,就可以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今后不管从事什么专业、什么行业,都会迸发后劲。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中小学必须不断增加新的教学内容,但是学制、课时是有限的常数,非但不可能延长学制、增加课时,相反还要求缩短学制、减少课时。在有限的学制、课时里,既要增加新的教学内容,又要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在此基础上提高教学质量,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也是一个永恒的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应当从不同层面(包括教育思想、观念,课程,教材,教法,考试评价)寻找办法。在教育思想、观念上,特别应当明确中小学的性质、任务和培养目标,中小学不可能承担所有的教育教学任务,中小学不可能把一切知识都教给学生。在课程结构上,应当增设综合课程、选修课程、短期课程等等。在课程管理上,应当使地方和学校拥有更多自主权、灵活性等等,以便于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在教学方法和考试评价的层面,也都可以找出有助于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